

# 孫文的次女孫琬與女婿王伯秋

## 孫琬與王伯秋

### ● 倪渭卿

#### 將門之子儀表非凡

孫文的次女孫琬與女婿王伯秋由相愛而結婚，恩愛異常，本是一雙佳偶。可惜婚姻短暫，說來話長。

王伯秋原名純燾，以字行，湖南湘鄉人，父親王謹臣，早年追隨曾國藩辦團練，官至常熟鎮總兵、台灣基隆鎮總兵、淮北水師提督，清廷誥授為建威將軍晉勇巴圖魯（滿語）。王伯秋出身官宦之家，將門之子，生於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自幼聰明好學，儀表非凡是一位大帥哥，抱救國大志。昆仲三人，二弟仲鈞，三弟季良，均品學兼優。

王伯秋年十七八歲，就讀於杭州武備學堂，獲得軍人基本知識，年廿歲（一九〇一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系，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革命組織——同盟會。因黃克強之介，為同盟會會員，此一時期結識了孫中山、楊度、宋教仁、黃興、邵元沖、張默君等，頗受孫中山總理的器重

和賞識，為同盟會傑出人才。不久，於一九一〇年，他又赴美國留學，進哈佛大學深造，這時孫中山的二女兒孫琬也在美國一家女子學院攻讀，孫中山即委託王伯秋照顧獨身在美的女兒，由於兩人皆在波士頓（Boston）攻讀，王伯秋和孫琬日久生情，互相愛慕。

#### 短暫婚姻難言苦衷

王伯秋和孫中山次女孫琬婚姻係於一九〇四年，便有正式結婚的一幕，孫琬和王伯秋婚後恩愛非常，一九一六年孫琬生女兒王纉蕙，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東西方交通阻塞，難以成行返國。一九一九年五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王伯秋和孫琬思鄉心切，便於這年秋天，攜女乘郵船返國，這時孫琬第二胎孩子即將分娩，也許由於大海的顛簸，祚盼大海的風平浪靜，使胎兒安穩出生，因此，為胎兒取名海平（就是今天的王弘之先生）。

王伯秋借孫琬回國，自是心喜，但兩人先赴東京住下，待了三個月，這裡自有一片難言苦衷，原來王伯秋在南京老家，已有妻室，妻子名李澄湘，並已生子王建寅，女兒王纉蕙，這些王伯秋皆曾告知孫琬，但是終於遭受到孫中山的反對，先前王伯秋和孫琬在美國結婚，孫中山並不反對，他瞭解王伯秋，是值得信賴的青年，當他得悉外孫女王纉蕙出生後，非常興奮，特囑孫科夫婦赴美探望，但當他後來明瞭女兒的婚姻糾葛，他決不希望這樣不合法的婚姻。當時王伯秋的父母親亦反對這一不合法的婚姻，於是，孫琬和王伯秋先到上海，孫琬和兒女住在兄長孫科家中，王伯秋風塵僕僕回南京老家，遭受母親堅決的反對，這一次婚姻結合就告吹了，但她仍想看看孫女、孫子，於是，叫供職南京江蘇省立通俗教育館的次子王仲鈞帶著奶媽到上海找孫琬，很順利的把王纉蕙、王弘之帶回南京撫養，這時孫琬奉孫中山之命回澳門，侍奉母親盧慕貞，就這樣與王伯秋

分手了。

嗣後於一九二二年孫中山要孫琬改嫁戴恩賽（廣東五華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嗣後入清華大學，一九一四年留學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國際法，得博士學位，戴恩賽與孫琬結婚後生子女各一。女兒名戴成功，兒子名戴永豐，一九二九年，戴恩賽被派為巴西公使，當孫琬偕戴恩賽往巴西之際；特寫信給王伯秋，到上海與王伯秋會面，這是與王伯秋闊別十年後的重逢，從這次敘遇，也就成了他們的永訣。以後就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 從事教育建樹良多

自從王伯秋和孫琬分手以後，便在南京從事教育工作，江蘇法政大學設於南京紅紙廊，原校長為王甸伯，湖北岳陽人，前清翰林，因病聘請王伯秋為教務長兼代校長，王伯秋到職以後，大加改革，任用馬元放為教務主任，聘請李無我（韓國人，教化學通論、民刑訴訟法兼教日文），鄭允教政治學，方文政教樂育、民法，趙韻逸教刑法，名書法家宗孝忱教國文，以上許多教授，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江蘇法政大學，環境清幽，教室數十間，校內有池塘，有園林幽靜之美，學生宿舍可容二百人，可是到了民國十四年，學生只有壹百六十人，每年招生一班四十人，前後共四班，這一幽靜校區，民國十六年以後，由國立政治大學接收，改

為國立政治大學的校址了。

民國十四年之際，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發生了軒然大波的事件，北京段執政（祺瑞）政府，教育部長易培基，明令將國立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免職，另派上海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前來接替，全體學生皆持反對，某日，胡敦復來校接事了，學生會代表在孟芳圖書館開了一個歡迎會，請吃茶以後，隨即宣佈歡送會，雇了一輛馬車，便這樣把胡敦復（無錫人）送走了。校中主持乏人，由教授會公推蔣維喬（竹莊）為代理校長，並選聘王伯秋為教務長，原來前教務長劉伯明業已逝世。國立東南大學人才濟濟，無論那個學院都有卓越的人才，譬如文學院有王伯伉、柳詒徵、陳漢章、胡小石、張欣海、湯用彤、宗白華、呂鳳至、徐悲鴻、張大千等，理學院有竺可楨、何魯、胡剛復等，教育學院有孟憲承、程時奎、陳鶴琴、鄭曉倉等。法學院有盧錫榮（晉侯）、葉元龍等皆卓著聲望，王伯秋又特聘羅家倫（志希）為史學系教授教中國近代史，方東美為哲學系教授專教哲學概論，這時國立東南大學學生只有壹仟三百人，教務工作尚且簡單，分為註冊組、課務組，到了十四年秋，又增加出版組印大批講義，便利教課，王伯秋自己教經濟學，選用 Ely's Elements of Economics 後來又改用 A. Marshall's Principle of Economics 以上兩書皆有名於世，這一期間，江蘇為多事之秋，經過齊盧之戰，江蘇一般名流

，如韓國鈞（紫石）、陳道遺、黃炎培、袁希濤等皆與王伯秋友善，因此隨時商討改進江蘇教育之建議，建樹頗多，王伯秋與邵元冲、張默君及南京江蘇第一中學校長章桐（鏡秋）友誼甚篤，暇即時有敘會，洵可樂也。

### 社會變遷政途受阻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社會環境有很大的變遷，國立東南大學，曾改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又改為江蘇大學，最後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在雞鳴山下成賢街四牌樓一帶，收購大批土地，校址也擴大了。

國民政府派張靜江的侄兒張乃燕（君謀）為校長，他是一位史學專家，精通五、六國文字，為人闊達，器宇軒昂，他把江蘇法政大學，河海工科學校，都合併起來，成為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分文、理、法、工、農、醫、商（醫、商兩學院設於上海）教育等八個學院，派戴志憲為教務長。這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許多名教授，亦到中大執教，如王世杰、周鯁生、錢端升、徐志摩、趙人嵩、雷海宗等，都是專任教授，儼然成為全國學術中心。

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後，王伯秋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當時院長為胡漢民）、考試院第一屆文官考試襄試委員等職。

一九三四年，他與他執教過的南京第一女子師範的高才生劉明水結婚，但不久因立法院院長孫科不滿他當年遺棄自己妹妹孫琬，認為這是無情無義，不負責任的行為，不堪為伍。就這樣莫名其妙的使王伯秋丟了立法委員之職，這是事實，不能有所分辯，徒喚奈何而已？於是王伯秋在政途上受到最大的阻力，這種事情的演變，也是當年預料不到的，孫琬始終還是愛王伯秋的，可是這一件事演變的經過，後來據孫琬自己解釋，這不能完全責怪王伯秋，其實大半因為孫中山的固執，就難以把事情弄得好轉了。這是命運，假使當年孫中山不加阻梗，這一婚姻也就順利通過了，這是決定了他們的一生，不錯，事情轉變，在於一念之間，這裡孫中山固執已見，刻薄寡恩，拆散女兒婚姻，使外孫兒外孫女享受不到家庭親情，孫中山不能算是通達人情的忠厚長者啊！

### 火柴公賣充裕財政

孫科利用權勢，迫使王伯秋離開立法院之後，王伯秋隨即任職蔣介石委員長南昌行轅秘書，這些地方蔣介石待人，比較孫中山、孫科要厚道得多了。南昌行轅人才濟濟，秘書長楊永泰（暢卿）是政學系巨子，老謀深算，最為傑出，高參中有辜仁發、趙啟騷皆是了不起的人才，與王伯秋都很友善，這時南昌行轅提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以碉堡政策及經濟封鎖對付共產黨。

民國二十三年秋，陳誠攻佔石城，收復寧都、長汀、瑞金，共黨的重鎮被攻佔，他們知道在此地難以立足，便集結八萬五千共軍奔向西北而去，中共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一直逃到陝北，最後在延安停留下來，準備於萬不得已時，再向甘肅、新疆逃去，依靠蘇聯，以作最後去向，南昌行轅結束了，王伯秋於抗戰期間，赴福建就任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等職，福建省主席陳儀（字公俠）懂得日本戰時經濟一套辦法，於是倡行五種民生必需品專賣制度，因為當時田賦已收歸中央管理了，省財政只好另圖開源方法，專賣制度，容易推行，於專賣物中有煙、酒、鹽、米、火柴等項。

火柴專賣一項，便是由王伯秋提出的，於省財政有很大幫助，陳儀說，火柴公賣，足夠福建省兩個月的開支，足見其重要性，這時日本軍已攻陷福州、廣州等地，國民經濟亦大有改變。

### 婚姻糾葛終生困厄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夏，重慶財政部長孔庸之電邀王伯秋赴渝，這是因為郭秉文（鴻聲）之介，邀約王伯秋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職，郭秉文任主任委員。

抗戰期間，因為中國輸出物資有錫礦、桐油等項，國際重視，這年五、六月間，王伯秋由福建永安動身，只帶了一員隨從，經

過長汀取道贛南、寧都、興國、贛州、湖南、衡陽，轉赴桂林，再由獨山轉赴貴陽，因途中辛勞過度，到了貴陽，便一病不起，不及延醫，以腦溢血逝世。

當時在貴陽的親友，組織治喪委員會，特為辦理喪事，由吳鼎昌、鄭道儒、周貽春（寄梅）、王漱芳（藝圃）時任職貴州省黨部主任委員，張廷休（子明）時任職國立貴州大學校長，方文政（樂胥）時任職貴陽地方法院推事等六人為治喪委員，並推鄭道儒（貴州省政府秘書長）為主任委員，喪事辦理完結，並派專人送靈柩至湖南湘鄉縣安葬。

一代哲人經濟學家，從此了結一生，不勝感慨系之！

王伯秋為飽學之士，非等閑之輩，若能人盡其才，顯達於時，對國家貢獻必有可觀，惜以婚姻糾葛，終生困厄，有志而不得申，以致埋沒其才，誠堪痛悼惋惜的！

附言：作者與王伯秋先生為師生關係，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在大學攻讀時期，經濟學一科，先得益王伯秋、葉元龍兩教授之啟迪，葉元龍開課名為高等經濟學，重視經濟分析，嗣後留學英國，獲益於凱因斯教授（J. M. Keynes）之教導，對於經濟理論體系，因而有精確之認識，時光迅速，轉眼七十餘年，意義猶新，所以永誌不忘。

一九九六年倪渭卿寫於洛杉磯